

# 沈葆楨：关键时刻能担当

沈葆楨是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台湾近代化的开创者。本文通过讲述沈葆楨“职业生涯”的两个片段，带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重要的福建人物。

## 片段一 1856年：广信之战

时间来到1856年，这一年，36岁的沈葆楨从在北京任职的御史职位上转任地方，来到江西九江担任知府，但因九江已被太平军占领，几个月后，清政府将他转派到了广信。沈葆楨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修书一封回福州，把夫人林普晴劝到江西。

这可不是在“发糖”，相反，沈葆楨是找夫人来“跳火坑”的。

广信府，在清政府官缺的考评里被列为“冲繁难”。所谓“冲”，意思是这个地方位于交通要冲，有重要的地理位置；“繁”，指的是这个地方政务多而繁杂，而“难”，是说这里民风彪悍，治理起来比较困难。

像广信这样的地方，在平时属于重要岗位。如果干得好，当然容易被上级看到，提拔也快。可对于沈葆楨来说，他上任的时候，并不是“平时”。这一年，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已经在先后击败清军设立的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后，开始大举进攻江西。江西14个府有8个陷落，75个县有53个被太平军占领。广信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为了稳定人心，沈葆楨请来了夫人。信里也讲得很明白，就是来做表率，安抚人心。他还直接在信里写，要做好死在这里的准备。

林普晴到广信不久，果然，太平军来攻，很快就攻下了贵溪县。在这紧要关头，沈葆楨正在50公里外筹集军饷，募集军队，来不及赶回。顿时，整座府城乱作一团，整座城的守兵不过400人，大多数官员和衙役四散逃跑，而林普晴以女儿之身尽显英雄气概。她刺破手指写血书给附近的将领饶廷选，请他看在原是林则徐部下的份上前来救援，还挥剑站在井边，表示如果敌人破城，她立刻自杀，表示了坚定的决心。

第二天，沈葆楨赶回广信城，再过两天，饶廷选和他的2100名士兵抵达城内。双方旋即展开激烈的攻防战。美国学者庞百腾在《沈葆楨评传》里说，绝望让被围困的人们竭尽最大努力。由于衙门里的官吏、办事人员和仆从跑了大半，林普晴自己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甚至为部队煮饭。而沈葆楨则尽力防守。由于将士用命，上下齐心，到9月13日，广信解围。

也许你会说，既然其他地方都可以丢，那沈葆楨又何必如此坚决，自己假装抵抗一下就好，为何一上来就摆出了视死如归的心态？

那是因为沈葆楨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林则徐，谥号“文忠”，这是林则徐去世后官方给他的评价，里面的“忠”不是随便给的：危身奉上曰忠，虑国忘家曰忠，让贤尽诚曰忠，危身利国曰忠……而沈葆楨10岁就跟着林则徐，受他耳提面命，即便是林则徐外出做官，也几乎是沈葆楨的每一封来信都要详细叮嘱批复，可以说视如己出。在这样的家风传承下，背负着林则徐后人的身份，沈葆楨殊死抵抗，绝不后退半步。

何况，广信太重要了。广信之战，不过分地说，帮当时处于危机之中的曾国藩解了围。曾国藩虽然贵为兵部侍郎，但在江西却处处受阻，不仅在军事上连吃败仗，甚至当地官员也都在看他的笑话，就想等着看他另辟蹊径建立的湘军丢人现眼。

如果广信丢了，曾国藩湘军仅存的一条通往浙江的通路也会断绝；如果广信丢了，清廷将不会再给曾国藩耐心和时间，留给他的或许就是死路一条。是沈葆楨在这个关键节点救了处在人生“至暗时刻”的曾国藩。

## 片段二 1866年：出任总理船政大臣

如果说守广信需要的是坚持和运气，那么在福州老家的第二道考验，则要复杂得多。1866年11月，因母亲去世而在福州守制的沈葆楨接到清廷谕令，命他出任总理船政大臣。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见识到英法美船坚炮利的威力，即便迟钝，终于也到了开始变革的时候。不过，买船还是造船，尚在摇摆。

1861年，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提议帮助清政府从英国订制军舰。很快这次尝试就变成了一场无比尴尬而丢脸的挫败。清政府花100万两银子，却



船政学堂（资料图）

连军舰的命名权都没有，更别说选择自己需要的轮船样式。更过分的是，英国人甚至不顾中方要求，擅自将购买军舰的要求变成了组建一支舰队，自作主张雇佣英国人担任舰队司令、军官和水手。当1863年这支舰队堂而皇之地开进天津港，清政府近乎目瞪口呆，家门口悍然多了一支“中英联合舰队”，炮口朝着港口，哪有半点自家舰队的模样。吃瘪的清廷只能解散了这支舰队，将所有船舰一并变卖了事。

闽浙总督左宗棠知道国家核心竞争力绝对买不来，一定得靠自己。1863年他就提出了自造军舰的设想。1866年，他一回到福州，立即开始筹备在福州马尾建立造船厂，并聘请法国军官日意格、德克碑作为顾问团队。可是，才过了几个月，还没等正式实施，他就接到了前往西北接任陕甘总督的调令。

为了让这项破天荒的大工程进行下去，他上书推荐自己的好友、江西巡抚沈葆楨来接替自己的事业。为了请沈葆楨出山，左宗棠说自己“三顾茅庐”，可沈葆楨依然以丁忧之名，拒绝出山。

沈葆楨并非推诿怕事之人，只不过船政事务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牵扯巨大，其中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必定万劫不复。其中有三对交织在一起的利益纷争。

首先，左宗棠已经是总督级的封疆大吏，人在陕甘，却在福建还留了一块自留地，沈葆楨与左宗棠关系融洽，



▲ 沈葆楨、林普晴坐像（资料图）

人尽皆知，必然遭到奉行“强干弱枝”的清廷的侧目和警觉，此时沈葆楨太过冒进只会起到反作用。

其次，船政是国家的船政，还是地方的船政？按左宗棠的设计，他希望船政是清政府的机构，是国家主导的改革措施，这样才能获得足够的政策红利，免受地方的牵制。这也是他看重巡抚级别的沈葆楨接替的重要原因。但设在福建的船政动用到其他省的资源，其他封疆大吏们会怎么看待它？

再次，在地方看来，船政这个大项目设在福建，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加上这个项目耗资巨大，其中的“寻租空间”必定让福建官员眼馋，诋毁中伤之事必定纷至沓来，稍不小心必定身败名裂。

但沈葆楨的谨慎并不意味着他退缩，他又何尝不知道自办军舰的重要意义。他所等待的，只是一个有利于更能做成事的政治环境。

他的解决方法是“拖”。左宗棠私人来请，他坚决不接受。等到11月，清廷谕令下，正式令他总理船政，他还是坚持要等第二年7月丁忧届满方能到府上任。但他答应，左宗棠离任后的事务，他在家与地方官员、船政筹备人员会商。这样就避免了私德有亏，被人攻击。

更关键的是，正如他所料，船政正式开始筹办，找事的人就上门了。新任闽浙总督吴棠上任后，听闻地方流传的小道消息称船政结党贪污和里通外国，以此为契机，插手整顿船政人事，还想缩减船政的开支。受这个事件的波及，船政内部人人自危，整个工程面临着停摆的危险。

沈葆楨看在眼里，依然忍字当头。一直等到1867年7月上任，才一改退避的姿态，名正言顺地发起猛烈的攻击，上奏严参吴棠。

沈葆楨的奏片写得漂亮，它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按国家给船政的制度设计，闽浙总督不能插手船政事务。第二，吴棠对船政的动作，摆明是针对陕甘总督左宗棠。第三，还隐含了自己本来就不想干，现在干不下去，只好辞官回家的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面上的道理，得说，但还不够。第二层意思就厉害了。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用兵，这时候船政出乱子，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西北的军心，这是朝廷当前关心的重点。第三层意思，则是沈葆楨隐忍一年营造的舆论。的确，清廷正式任命的船政大臣，船政建设的重金又已经陆续支出，此时更换船政领导人，是极丢脸面的事。

果不其然，清廷很快下文安抚沈葆楨等人，并将吴棠调至四川，算是平息了这场风波。

沈葆楨的处理方式，对初期的船政显出特殊的意义。他借此展现了突出的政治魄力，而清廷的一面倒处理让外界感觉沈葆楨在清廷的影响力极大，增强了船政大臣的权威。加上沈葆楨在福州的巨大影响力，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建成保驾护航。正是因为沈葆楨的经略，才有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造船厂、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海军舰队，才有了严复、詹天佑、萨镇冰这些赫赫有名的先驱者。

（赵凯）

历史深处的

福建名人